

路遥,您再来看一看龙桥

11月17日,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、著名作家路遥病逝27年的忌日。面对扑面而来的寒流寒风,当年,我惊闻路遥辞世时的瞬间,如在眼前……

看到报纸上“路遥远去”的一个个黑字,我的头好像挨了一记闷棍,除了嗡嗡作响之外,一片空白,我一下呆了……

路遥,1949年11月出生,在其正当不惑之年时,似日行中天,英姿勃发,文思如泉,巨著如山。你的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,像激浪排空的阵阵海潮,呼啸了整个中国。

然而,现实是这样残酷无情,历史是这样不可变易——“人生”不“平凡”的著名作家路遥,终于离我们远去了。这个敦实、健壮、像他家乡清润的石板一样的陕北汉子,却像经过千百年风剥雨蚀的石板一样风化了。这块石板的破碎,是陕西文坛,也是中国文坛“惊心动魄的一幕”!

数十天来,面对报刊上一篇又一篇悼念路遥的文章,我的眼前一片模糊,总觉得他还活着。我们相识的往事,仿佛就在昨天……

70年代第一春,我在延安地区政法组工作,他在延川县文艺创作组创作。我们都爱好写诗,都在《延安报》(当时叫《延安通讯》)上发表过诗歌。也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,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们在编辑部所在的窑洞外相遇了。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,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……

1986年5月下旬,三原县举办文学创作座谈会,让我邀请部分省、市作家来三原给与会的文学爱好者谈创作。路遥自然在被邀之列。

我到省作协门口,刚想溜进去,却被忠于职守的门房老汉拦住了。尽管我说得天花乱坠、口干舌燥,老汉斩钉截铁只有一句话:“找别人我去叫,找他不行!”“为啥?”我问。老汉答:“路遥有交待,就是他爸来他也不见!”看我满腹疑

惑,老汉解释说:“路遥正在没黑没明赶写一个长东西,西北大学来车都没请去。他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,你最好再打搅!”还摆出一副要赶人的架势。我进退两难,踌躇了半晌:县里百余个文学爱好者想听他谈创作,不见他一面,回去咋向那些企盼的目光交待?无奈,我恳求老汉:“你就说延安时的老朋友吴树民找他,他若不见,我转身就走!”经不住我的软缠硬磨,老汉答应试试。老汉进去一会儿,路遥出来了。他上身穿着一件粗针毛衣,又宽又大,满脸倦容,宽边眼镜也遮不住连续拼搏后两眼泛出的浓重的青灰色墨圈。他说正在赶写《平凡的世界》,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也来人催稿,不得不闭门谢客。“不过,你来得好,我可以休息一会儿了!”我说明来意,他稍作沉思,即和我约定了讲座时间。

我把喜讯带回三原,会上会下一片欢腾。轮他讲的那天清晨,派车去接他。我因陪同先来的赵熙、白描、峭石、沙石、商子雍等文坛大家,未能成行。文学爱好者纷纷问我:“路遥啥时讲?能讲多长时间?”我胸有成竹地回答:“来了就讲!再短还不讲两个小时!”10时许,车归,未见路遥,却下来一位翩翩女士。我忙问缘故,接的人说,路遥已走到车门口,想起创作时间紧迫,又返回,让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催稿的女士来讲一讲。我默然良久,知道他已进入“白刃格斗”,不然,他是绝不会食言的。

那位女士披肩发,一身雪白的连衣裙,讲了些什么,我一个字也记不得了,只记得她讲了不到5分钟,抽了3支烟。以致于会后有人调侃说:“北京来的女士给咱做了一场吸烟表演!”1989年春节前夕,我和有关同志筹备《三原

报》复刊试刊稿件。为了扩大副刊“龙桥”的知名度,我去西安请文学界的前辈和朋友题写“龙桥”二字,先找省作协主席、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采老师和省作协副主席、著名作家杜鹏程老师濡墨挥毫。他们的墨宝,分别发表在《三原报》试刊第1、2期刊上。接着,我去找路遥。

那是一个上午,路遥去车站送完人刚回来。书柜下,摆着一片鞋鞋;茶几上,放着几杯残茶。我说完请求,特别加重语气说,名人的字画难求。他憨厚一笑说:“你让我写嘛,没问题。可惜没纸!”我从提兜掏出事先裁好的宣纸。他愣了一下,遗憾地说:“没有笔墨,用钢笔写行不行?”我说:“笔划太细,不好制版。”我又从提兜的塑料袋里掏出毛笔和墨盒。他笑着说:“你这兜成了百宝箱了,有啥有啥!”说着,展纸濡笔,十分认真地写下“龙桥”二字。临走时,我又从“百宝箱”里掏出两包薯片、两包核桃薄脆、一瓶香油、一瓶芝麻酱聊表谢意。他推托不过,搓着手收下了,显得很不好意思。分别时,我邀他来三原一游,他紧握着我的手说:“等有空,我一定去三原再看一看龙桥!”这天天气阴冷,我的眼前却是一派春光,身上也暖烘烘的。因为我的提兜里装有一件珍宝。

路遥题写的“龙桥”,刊登在《三原报》试刊第3期上。我觉得那字漂亮潇洒,刊出后再三玩赏,十分得意。后来,我还约他为“龙桥”副刊撰稿,他答应了,可惜未能遂愿。他题写的“龙桥”二字,竟成了给《三原报》的绝笔。

路遥,你不是答应再来看一看龙桥吗?我又邀请你,你听到了吗? □吴树民

往事

惠通桥

改变抗战历史的桥

不为过。若命丧桥头的商人地下有知,该庆幸他的死价值无量。一声枪响,一座桥没了,怒江天险,日军架桥不得前进,从而

保全了昆明保全了陪都重庆。桥毁路断,1938年修建的滇缅公路由此中断两年多,直到1944年9月,滇西松山战役和腾冲光复,才重新恢复通车。这条滇缅公路是世界筑路历史上一个壮举和奇迹,从昆明至畹町长945.4公里的公路,竟是妇孺幼20万同胞自己带上工具,义务出工,仅用八个月,以3000多人病饿意外死亡的生命代价修建而成的,这条路是援华抗战物资的生命线输血管。

重新修复的惠通桥,早已不再使用,成了历史文物,更是抗战胜利的重要参与和见证物品。在它不远处有了更宏伟美观的新桥和高速公路桥,还有一座按原桥缩小版的惠通桥,供人们参观凭吊追忆往昔。

钩沉



云南西面有条江,江上有座桥,这条江这座桥,曾经改变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命运。这条江就是怒江,这座桥就是惠通桥。

在人们仍然沉浸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余热时,十一月的头一天,我来到了高黎贡山的脚下,来到怒江大峡谷,站在惠通桥的桥头。微风徐徐,吹乱我头上仅存的秋丝。这风来自西面的高黎贡山,山里不远的邻国缅甸,山山相连就是野人山,当年我远征军将士命殒于此,其中就有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。

1942年5月5日,日军化妆成当地难民混杂在南退的人群中,企图闯关夺桥。此时的惠通桥在中国军队的守卫中,已经填装了炸药可随时引爆,但因连绵不休的后退守军和难民,炸桥的时间不得不再延迟。

一位强悍无理的中国商人的汽车坏在桥中间,前不得退不得,守桥士兵要把车推向江中疏通,商人阻止,士兵焦急开枪毙其性命。这一枪,使化妆的小鬼子心虚以为自己暴露,慌忙开枪还击,守桥官兵见此,果断下令炸桥。

一声巨响,桥毁于怒江之中,江水滔滔不绝。

历史的偶然性竟如此的令人惊叹。要感谢那位蛮横无理的商人,也要感谢果断开枪的守桥士兵。这一声枪响,日后产生的作用影响,怎样估计都

人物春秋

李微含是谁?

李微含是一位作家,一位老作家,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老作家。他和李克合著的长篇小说《地道战》,1953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,封面画为大画家罗工柳的作品,可见当时该书的地位不可小觑。他1922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韩村堡,1939年参加革命后,入延安鲁艺学习,历任延安抗战剧团演员,边区艺术学校教师,人民文工团创作员,解放后任北京市文艺处编审科长,北京市文联编辑部主任,《北京文艺》编辑。在担任北京文艺编审科长期间,他和端木蕻良等著名作家,协助赵树理编辑《说说唱唱》,与周扬合编了一部陕北民歌选。

然而就是这么一位颇有声望的大作家,竟然被他家乡一个刊物的青年编辑多次寻找,庐山真面目才被寻觅到。2018年冬,我年逾85岁的老父亲屈超耘接到来自《周山至水》编辑部马选红先生打来的电话,原来,他为了寻找周至县已故多年的知名作家李微含,辗转了数月才把电话打到了父亲这。

令父亲疑惑的是,马选红先生是怎么知道他与李微含的关系的?

说起马选红寻找李微含,可真是一波三折。《周山至水》是周至县的一本乡土刊物,专登周至的知名名事、名人名水、名楼名阁。当马选红得知李微含这位名作家是周至县人时,便开始了寻找之旅,他找遍了周至县的各种文化人,但对方都说不知道。最后,他想到了周至的另一文化名人周明,他50年代中期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就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,曾任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常务副主编,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,他的那部《冰心》中外闻名。然而周明先生说,李微含其人他只听说过,具体情况他了解不多。

虽然有些沮丧,但马先生仍然多渠道打听,最后打听到原陕西省作协办公室主任姜鸿章先生,由于姜先生的老家在户县,也就是

今天的鄠邑区,且是80多岁的老人,估计他应该熟悉李微含。去年金秋时节一个晴朗的周日,马先生又辗转来到了鄠邑区,在一所小镇的民居里,他见到了姜先生,而得到的回答令马先生更加郁闷,这位在作协工作了数十年的老文艺工作者,却不知道李微含是何许人也。而意外的收获是,姜先生的堂侄孙、西安高新学院的团委书记姜正一,却是户县籍老作家屈超耘的孙女婿,于是,便拿到了父亲的电话号码。

马先生之所以要找我父亲屈超耘,是由于在新浪博客上,读到了我的一篇纪实散文《我的两个父亲》,在这篇文章里我详细介绍了两个父亲的一生,尤其是我的亲生父亲,是在得到了作家李微含的鼓励与赠书后,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我的这篇文章刊出后,被不少网友转载。没想到就是这段文字成全了马先生,让他在踏破铁鞋无觅处时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两位一老一少、同为终南山下的乡党文友,在父亲的寄寓书房里娓娓交谈了一个下午,有关父亲与李微含的相识与相交,听得马先生激动万分。

那是1950年春季,15岁的父亲在他舅舅家养病,一个晴朗的早上,正在台阶上与外婆晒太阳的父亲,突然看到一个穿着四个兜兜干部装的人,向他和外婆走来。外婆问他谁哩?“三婆,你不认得我,我是端端(李的奶名),来看你来了。”“是端端,三婆都认不出来了。”父亲看着气度不凡的陌生人,就向外婆端端是谁?外婆说,他是村东头九舅家的儿子端端。说着,父亲的外婆和端端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叙家常,对父亲说,去给你端端哥端茶去。

父亲从屋里端来了茶后,就与他的端端哥聊上了。“你在武成中学念书,有个叫曹文翰的老师你认得不?”“认得,他是我的国文

老师。”端端哥说,曹文翰和他同过学。聊了几句闲话,父亲就想到了九舅解放后说的话,便问端端哥:“听我九舅说,你是给毛主席当秘书的大干部,回来咋不坐屎巴牛小轿车哩?”“甭听你舅胡说,人家毛主席的秘书长叫李维汉,咱是李微含,虽然名字的发音一样,却是两个人,人家确实是毛主席的秘书长,咱是写文章的小人物。”接着,他又笑着说:“说来我过去的名字确实叫李维汉,到了鲁艺后,周扬同志说,我的名字与李维汉同名,就将我的名字改成了李微含,微笑的含,含苞待放的含。”

父亲一听说端端哥是写文章的,更加来了精神,就给他讲了自己的一件小事。刚上了两年初中的父亲,因为爱好文学,曾在学校

了一部小说《渭河两岸》,那是一种粗糙的黄色纸印成的长篇小说。

也正是李微含先生的这一鼓励,1951年父亲参加了工作,继而放弃了他在省城工作的优越条件,来到了秦岭深处的商洛山里,开始了漫长的艰苦生活体验。在商洛山里,父亲一边积极工作,一边被火热的生活所感染,创作出了许多生活气息浓郁的作品,小说《我和永清》、诗歌《测量队来到了丹江边》、戏剧《桑园人家》就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。尤其是戏剧《桑园人家》出版了单行本后,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。改革开放后,他又写起了杂文,还当选了陕西杂文学会副会长。

当马选红先生看到客厅里悬挂的寄寓庄庄号时,便问父亲是怎么来的?父亲说这要感谢《西安晚报》的副总编辑高平先生,是他1984年6月远赴丹凤组稿,从7月起《寄寓庄杂记》专栏在该报连载。父亲说,其实,他从1957年发表诗歌《迎春曲》,到2007年的随笔《爱荷新新说》,他与《西安晚报》有整整50年的交情,期间《四十六

载翰墨缘》叙说与《西安晚报》结下了友情。也就是从此“寄寓庄”成了他的斋号。父亲的文学创作有了点名堂后,他欲联系曾鼓励他的老师端端哥,也就是李微含先生,不料,自己好几封信都石沉大海。直到80年代末,突然一个从北京市文联回丹凤探亲的老先生,找到了父亲聊天,当谈到李微含时,老先生告诉父亲,他曾经和李微含先生在一起工作过,李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,平反后又回到了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工作,1985年因病去世,终年63岁。

为了怀念这位鼓励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作家老师,父亲在省新闻出版局内部刊物《书海》上发表了纪念文章,以寄托他对端端哥的思念之情。父亲的娓娓讲述,听得马选

寻找李微含

墙上写了一篇题为《满山红叶》的小文章,竟被老师叫去追问是啥意思。他给老师解释说,那是在村子后面,有一片柿林,到了秋末初冬时节,树叶全变成了红色,十分好看,没有别的意思。在那个忌讳红色的年代,老师知道了原委后才没有追究。听了父亲的话,端端哥说:“亲民(父亲的奶名),你爱好文学,可你要知道,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为社会服务的,我们共产党的文学作品,是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。要当作家就得去艰苦的地方熟悉生活、感悟生活,就得多读书多思考,把自己熟悉、感悟、思考的东西,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下来,再经过艺术的加工后就变成了文学作品。”由于这次两人谈得很投机,第二天那个自称端端哥的人又来到父亲的舅家,送给他

红先生唏嘘不已,并特意向父亲约稿《怀念作家李微含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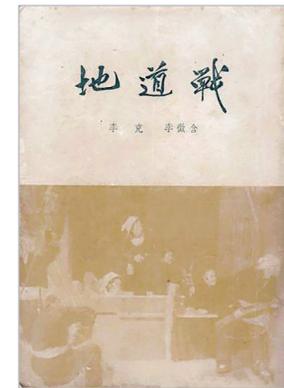
至于李微含这样有成就的作家,为何不被地方人所熟知,那是因为他1939年就离开了故乡,1957年划右,创作、发表作品的自由被限制,艺术生命被早早地扼杀了,尽管后来得到了平反,但已步入老境,很少回终南山下的周至老家,直到1985年去世。先生去世后,尽管父亲在《书海》杂志上发表过怀念文章,但那是一本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,也就鲜有人知。特别是李微含的家乡韩村在1958年由于县域调整划归户县,时过境迁,周至人不知道,户县人也不知道,这才造成马选红为寻找他费了一番周折。

让我值得欣慰的是,自己不经意的一段文字,却成就了让后人得以知晓大作家的机会。在我看来,虽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但文学作品的生命却是无限的,就像先生的小说《地道战》,尽管它不是影视剧中的地道战,但只要人们提起这部作品,自然就会记起有一个大作家,他的名字叫李微含。 □刘丹影

地道战

李 克 李 微 含

长篇小说《地道战》



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CN61-0015 邮发代号51-7 陕工网:www.sxworker.com



扫描二维码

订阅陕工报

欢迎订阅

价格:228元/年

电话:029-87345725

联系人:刘海英